

志愿军老战士：遗憾未能和战友们一起冲锋

11月29日上午，第十一批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以此致敬和缅怀英雄。

抗美援朝战争中那些“最可爱的人”，很多已离世或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们的精神被一代代中华儿女铭记在心。在辽宁丹东，一支团队用镜头记录下志愿军老战士们珍贵的口述历史。

据央视新闻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韩远泉 94岁
我们不得不那么做 不得不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韩德彰 (2024年去世)
懂得过去才知道今天的可贵

“我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和战友们一起冲锋”

2019年7月，丹东市融媒体中心《铭记》工作部正式组建，他们坚持在全国范围内抢救性采访抗美援朝老战士和英雄模范，创作《铭记》纪录片、图书、音像制品等，拍摄素材时长近1000小时，收集整理文字资料、采访笔记超过1000万字。

而寻找并面对面采访拍摄这些散落在五湖四海的志愿军老战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联系的过程中，很多老兵不相信我们，家属存在迟疑，说你们是什么媒体？你们为什么要干这个工作？”团队编导张蕾表示，老战士们平均年龄在九十多岁，考虑到他们

的身体状况，采访时间控制在一小时左右。

“他有些记忆比较模糊或者是碎片化的。你怎么引导他，是比较难的。”张蕾表示，在有限的时间内挖掘并引导老战士们讲述以往的经历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周全弟是长津湖战役中的幸存者之一，入朝时他只有16岁。在黄草岭的阻击战中，他在零下40多度的低温中卧雪三日，纹丝不动。当冲锋号吹响的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的四肢已经冻僵，无法起身和战友一起冲锋。

“我才16岁，就没有手、没有脚了。”周全弟入朝参战仅半个月，他的四肢就因严重冻伤而不得不截肢，可他却说：“相比身体的残疾，我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和战友们一起冲锋。”

几年来，像周全弟老人这样的志愿军老战士，纪录片《铭记》团队采访了700多位。

在四川绵阳，团队采访了最早发现邱少云烈士遗体的战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三千米封锁线把邱少云烈士的遗体带回。在此过程中，其中两名担架队员不幸中弹负伤。

“为了那一具烧焦的遗体，为什么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给他抬出来？”《铭记》工作部编导张蕾轻声询问。老战士闻言，激动地掉下眼泪，“我们心里头如刀绞，我们不得不那么做，他是我的战友。”

“可把你们盼来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2020年8月31日，抗美援朝口

述历史纪录片《铭记》顺利播出，创作团队收到志愿军老战士的线索也越来越多。

每次采访快要结束时，张蕾都会问一句话，“您认为志愿军精神是什么？”

“不怕死喽，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很多老战士都表达了这样的想法，他们也说“我们入朝之前其实就没想回来，抱着必死的信念过的江、入的朝，没打算回来。参加每场战斗，我们觉得活下来就赚了，死了、牺牲了就值了”。

如今，这些志愿军老战士平均年龄超过90岁，《铭记》工作部创作团队采访过的老战士中有三分之一已离世。与时间赛跑成了《铭记》工作部创作团队采访中的常态，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能等，老战士们等不了”。

2020年9月，张萍到上海采访韩德彰中将，他见到团队的第一句话就是：“可把你们盼来了，再晚就来不及了。”张萍注意到韩德彰的腿有明显的浮肿，韩德彰也坦言：“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

这次采访给张萍带来极大的触动，随后有感而发地写了一篇手记《再晚就来不及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她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

“如果不讲述，谁会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在采访过程中，很多志愿军老战士纷纷表示：“我不是英雄，牺牲的人才是英雄”。尽管他们自身经

历丰富，战功赫赫，但在镜头前，他们更愿意分享战友们的英勇事迹。

唐章洪曾靠一门炮打死了725个敌人，是全军响当当的人物。然而，在接受采访时，他却一直在讲述他的战友。

“我只想讲述我的那些战友，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军功章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和战友一起打下来的。如果我不讲述，谁会知道他们都经历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

牟元礼是团队去年4月在重庆采访的志愿军老战士。他讲述了541高地中的战斗，当时阵地上只剩下他和战友杨春增，他亲眼目睹排长杨春增手持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多年来，牟元礼始终在讲述杨春增的故事，尽管他自己也是一位15岁就获得一等功的功臣。

在这些年的采访中，许多志愿军老战士在回忆入朝参战经历时，会主动唱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他们端坐挺胸，精神焕发，眼神中闪烁着年轻时的光芒，仿佛又看到了七十多年前跨过鸭绿江的英勇瞬间。

截至2024年11月末，抗美援朝口述历史大型系列纪录片《铭记》已播出278集。《铭记》的故事还在继续。

张萍表示，5年过去，自己感到责任更加重大。老战士们越来越少了，他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大。“我们的采访难度可能会比5年前还要困难重重，但我们还想尽最大努力去采访这些老战士，直到最后一位老战士离世。”



文脉贯通，斯文在兹。本期讲述在南京金融界“解放战争”中“经协南京分会”“银钱业工作委员会”以及南京中行的革命斗争故事。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陆续迁回。早在抗战时期，就有中共地下党员深入到国民党的金融机构。随着时局的变化，他们也随之迁来南京。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意识到，这正是开展金融战线革命斗争的绝佳时机。在中共南京市委的指导下，“经协南京分会”“银钱业工作委员会”以及南京中行积极投身经济金融战线的“解放战争”。

通讯员 蒋中宇 李庄

南京中行积极投身南京金融界“解放战争”

独立作战 因地制宜开展群众斗争

经协南京分会成立之前，原本隐蔽在各个金融机构的地下党员没有横向关系。他们根据“勤学勤业，广交朋友”和“发展进步势力，孤立反动势力”的方针，各自独立作战，积极开展群众活动，团结和带领银行员工，向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

1946年6月23日，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成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任团长，从上海赴南京请愿。赴南京途经镇江时，遭到一批特务、暴徒登岸辱骂，代表们据理力争才得以脱身。晚上7时，代表团一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就遭到埋伏在站内的大批特务、暴徒的围攻殴打，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等4位代表被打伤。直到深夜，受伤的代表才被送到中央医院救治。当晚，中共代表团赴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并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经协”南京分会参加了此次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斗争，声援他们的正义行动。“经协”南京

分会承担请愿团的接待和联络工作，由成员出面，在鼓楼兴泰旅社订了两个房间。事件爆发后，南京中行地下党员耿一民、支从敦等人前去兴泰旅社，绕过鼓楼军警警戒点，从后门进入旅社，与和平代表团的罗叔章、胡子婴商议组织群众进行慰问，同时安置相关人员疗伤。

当时南京城内白色恐怖笼罩，银行系统员工背景复杂，“经协”南京分会大多采取隐蔽的活动方式。他们定期举行座谈会、形势报告会，讨论时局和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宣传我党的经济政策，在银行职工中扩大我党的影响。“经协”南京分会成功团结了一批工商界和银行业的知名人士，发展会员60多人。而其他系统的地下党员也根据银钱业的情况和特点，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为职工争取合法权益等进行了斗争。

去留抉择 因势而动引导群众抵抗

1948年下半年，革命胜利大局已定。其后，蒋介石隐退，以李宗仁为代总统出面主持和谈，力图划江而治，同时命令在南京的机关、学校、工厂等向广州和台湾撤退。针对这种情况，中共

南京市委要求各单位地下党，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等活动，反对和阻止搬迁，尽可能争取大多数人留下来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南京中行地下党员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积极组织开展了护行留人等工作。一次，在南京各银行上层和银行同业公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们得知，国民党当局策划银行业的搬迁问题，准备把首都汽车公司的数十辆汽车都包下来，以备撤退，要求各银行开始做登记造册的准备工作。根据这一情况，他们及时作出行动部署，要求党员尽量打乱敌人的搬迁部署，向群众做好宣传工作，争取更多的人留下来。

同时，耿一民自在南京小火瓦巷中行宿舍印制大量传单，号召群众为迎接南京解放做准备。为了防止国民党搜查抓人，他们安排了几个人在楼下打牌望风做掩护。据耿瑜（耿一民儿子）回忆：“父亲有一次去发放传单，礼堂还有人开会，他便把印好的传单放在礼堂边上的窗口，然后打开窗户转身走了。后来起风了，风把窗口的传单吹进了礼堂。现在想想当时那样做是很危险的，如果被当局抓到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父亲跟几个儿女回忆

这件事时，并没有说太多，他对党的忠诚信仰已经刻印在脑海里了，革命斗争让他顾不得思考许多。”

“护行行动” 因行施策守住人民财产

1948年11月，中共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成立了银钱业工作委员会，将各银行的党员划归银钱业工委统一管理。在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银钱业工作委员会（南京市党组织重要组织机构之一）全力以赴投入护行护局迎解放的斗争中。

为保护银行账册财产、挽留人员迎接解放，南京中行地下党员组织成立了“应变会”，一方面关注中行南京分行人员，特别是上层人员动向，有重点地解除他们的顾虑，劝他们留下来为人民政权服务。经多方引导，南京解放时，中行南京分行从副经理袁行济、襄理钱道康到员工300余人全部坚守岗位。另一方面组织员工对全行账册、档案、房产、物资等进行清理登记，指定专人保管。

南京解放前，中行南京分行领导人将大部分黄金转移存放到上海中行，并以“宁任远”的身份

开户，将这笔巨大金额的黄金存在其名下。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上海尚未解放，为防止宁宁的当局领导人再度夺取，负责南京中行地下党工作的耿一民与党员丁永楨、支从敦等一起在4月25日急电上海中行：“南京已解放，‘宁任远’开户的1100两黄金冻结，不准任何人开箱提取，如被提取，概由你行负责。”上海解放后，这笔财产悉数回到人民手中。

解放后，由于南京中行地下党员前期做了大量工作，各项交接工作都做得比较好，档案账册完整，财产物资没有散失，交接清晰齐整，受到表扬。后来，作为耿一民上级党组织负责人的顾公泰在回忆中也谈到：“当时，邮汇总局和中国银行党的力量较强，工委就以这两个单位为主，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做好保护账册、档案和国家资财的工作，并且通过“银社”的活动，影响、带动其他各行、局一起行动起来，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创造条件。”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每一项艰巨繁重的任务都闪现着共产党人的身影，他们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致敬的榜样。传承红色基因，讲好中行故事，不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